



吴良镛·主编

中国古代建筑 艺术探源

刘敦桢·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吴良镛·主编

中国古代塔刹 艺术探源

刘敦桢·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塔刹艺术探源 / 刘敦桢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6

(文史存典系列丛书·建筑卷)

ISBN 978-7-5205-0179-8

I. ①中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古塔—研究—中国②寺庙—研究—中国 IV. ①K928.7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2865 号

出品人: 刘未鸣

责任编辑: 窦忠如 张蕊燕

策划人: 窦忠如

责任校对: 程铁柱

装帧设计: 润一文化

实习编辑: 孟凡龙 王 丰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—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—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毫米 × 889 毫米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06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6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《文史存典系列丛书》学术顾问委员会

(按照姓氏笔画排序)

冯其庸 冯骥才 刘庆柱 许嘉璐

杨乃济 吴良镛 陈建功 李学勤

李敬泽 罗 杨 郑欣淼 耿宝昌

舒 乙 谢辰生 傅熹年 樊锦诗

出版说明

中华民族历史悠久，文化源远流长，各个领域都熠熠闪光，文史著述灿若星辰。遗憾的是，“五四”以降，中华传统文化被弃之如敝屣，西风一度压倒东风。“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。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，也是我们在激荡的世界文化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。因此，国人需要文化自觉的意识与文化自尊的态度，更需要文化精神的自强与文化自信的彰显。有鉴于此，我社以第五编辑室为班底，在社领导的统筹安排下，在兄弟编辑室的通力合作下，在文化大家与学术巨擘的倾力襄助下，耗时十三个月，在浩如烟海的近代经典文史著述中，将这些文史大家的代表作、经典等遴选结集出版，取名《文史存典系列丛书》（拟10卷），每卷成立编委会，特邀该领域具有标志性、旗帜性的学术文化名家为主编。

“横空盘硬语，妥帖力排奭。”经典不是抽象的符号，而是一篇一篇具体的文章，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，更有学术传承的崇高价值。此次推出第一辑五卷，包括文物卷、考古卷、文化卷、建筑卷、史学卷。文物卷特请谢辰生先生为主编，透过王国维、傅增湘、朱家溍等诸位先生的笔端，撷取时光中的吉光片羽，欣赏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；考古卷特请刘庆柱先生为主编，选取梁思永、董作宾、曾昭燏先生等诸位考古学家的作品，将历史与当下凝在笔端，化作一条纽带，让我们可以触摸时空的温度；文化卷特请冯骥才先生为主编，胡适、陈梦家、林语堂等诸位先生的笔锋所指之处，让内心深处发出自我叩问，于

夜阑人静处回响；建筑卷特请吴良镛先生为主编，选取梁思成、林徽因、刘敦桢等诸位哲匠的作品，遍览亭台、楼榭、古城墙，感叹传统建筑工艺的“尺蠖规矩”；史学卷特请李学勤先生为主编，跟随梁启超、陈寅恪、傅斯年等诸位史学大家的笔尖游走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来一番对悠悠岁月的探源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限于我们编辑的学识，加之时间紧促等缘故，遴选的文章未必尽如人意，编选体例未必尽符规律，编校质量未必毫无差错，但是谨慎、认真、细致与用心是我们编辑恪守的宗旨，故此敬请方家不吝指谬。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2018年4月16日

目 录

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 / 1

中国之塔 / 9

略述中国的宗教和宗教建筑 / 29

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 / 36

北平护国寺残迹 / 81

云南之塔幢 / 119

苏州云岩寺塔 / 140

河北涞水县水北村石塔 / 155

江苏吴县罗汉院双塔 / 164

河北定县开元寺塔 / 199

河南济源县延庆寺舍利塔 / 232

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

世界上无论何种民族之建筑，在中世纪以前，其发达之主要精神原因，皆不出政治与宗教二者。然政治势力，究不若宗教之富于普遍性，故就沟通各民族之文化，影响于建筑方面言之，而政治恒难逮及宗教。此现象非但欧洲如是，即印度与中国，亦无不同出一轨。

我国古代宗教虽以释、道并著，然道教在历史上素以式微不振见称，其与我国文化发生密切关系者，当推佛教为最。佛教自西汉末期，经西域诸国辗转传来，至东汉、三国之际，渐就萌葱。晋元康以降，群雄割据，战乱相寻者，前后近三百年。史称当时人民，相与祝发出家，寄托沙门，以图幸免锋镝、徭役之苦。故自晋安、萧齐以

后，佛教之发达，几如水之赴壑，其势不可复阻。降及隋、唐，号称全盛。在此时期内，营造寺、塔之风，风靡全国。此等建筑之外观，大都采引印度与西域式样，以表现宗教之特有形式。然时间既久，泽布风遗，其影响遂不仅限于此。故自佛教东来以后，我国建筑受此文化之浸濡，实甚深广。

虽然中国建筑受佛教影响究竟至何程度，此洵为不易解决之问题。盖建筑学在古代中国，数千年来恒视为卑不足道之匠技，除北宋李明仲所著《营造法式》三十四卷与清雍正间所颁《工部工程做法则例》七十四卷外，几无专门纪述之书。至于秦、汉以前之建筑，久已沦为尘壤，化作烟风。今之幸存者，大都为六朝以后之遗物，然亦任其支撑于荒烟蔓草间，剥落颓圯，迄乏系统之调查。兹篇所述，系以现有资料为准，暂分装饰、雕刻与构造二类讨论之，挂一漏万，在所难免，祈阅者谅焉。

一、装饰、雕刻

建筑之起源，肇于人类之庇护躯体，故上古时代建筑，祈求抵御凛烈之气候与凶猛之野兽。《易》所谓“上栋下宇，以俟风雨”者是也。其后人群演进，踵事增华，始于建筑之表面涂以色彩，描以画图，裹以锦绣，垂以幕帷。然以上种种，俱属平面之装饰，至于利用雕刻等立体形象，以文饰建筑物者，其时代则远在上述各项艺术昌明以后。我国秦、汉以前之建筑，亦大抵利用色彩与图绘者多，而采取雕刻诸技艺者少。如《礼记》谓：“棖画侏儒”；《周官》谓：“以猷鬼神祇”；《礼记》又谓：“楹：天子丹，诸侯黝，大夫苍，士黻”；《两都赋》谓：“屋不呈材，墙不露形，裹以藻绣，络以纶连”；《汉书》谓：“昭阳殿中庭彤朱，而殿上髹漆”；《长门赋》谓：“致错石之瓴甓

兮，象玳瑁之文章”。由是而观，可知古代宫殿建筑之墙壁、地面，以及木造部分，殆全为绘画与色彩所占领。至于建筑物之利用雕刻者，仅为极少数之局部装饰，如《两都赋》谓：“雕玉瑱以居楹”；《西京赋》谓：“镂槛文櫨”之类而已。其所以相异如是者，盖因绘画较简而易举，不若雕刻之繁缛而难工，此在械具与艺术尚未十分发达之社会，殆为不可免之事实。唯其如是，致使雕刻之技术益迟迟不克进步，故两汉诸帝表彰功臣于麒麟阁与云台，不云雕像，而云图形，恐亦因凿刻尚未风行之故也。而证之事实，汉末石刻如山东嘉祥武梁祠及肥城孝堂山郭巨祠二处，均为粗浅之平面浮雕（relief），其构图简朴，线条古拙，亦足为当时雕刻尚未臻发达之证据也。

刺激此粗朴之雕刻而使之发达者，则为佛教之输入。释教自东晋以后，风靡华夏。《魏书·释老志》谓北魏末期，江淮以北号称寺刹者，达三万余所。其说虽不足全信，而当时伽蓝、浮屠之盛，要为无可讳掩之事实。伴此寺刹而俱兴者，则为佛像之雕塑。然此为立体之圆雕，非平面之浮刻也。不仅佛像本身如是，其他之附属物，如莲座、背光等，亦无一不利用精美之雕技。故我国固有之雕刻术，自受佛教艺术影响后，遂作长足突飞之进步。其表现之方法，自平面易而为立体，其构图自形似进而为写实，其线条自古拙变而为圆熟。吾辈试取汉、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诸代之雕刻，比较而观之，如汉之武梁祠、郭巨祠，前秦之敦煌石窟，北凉之凉州石窟^[1]，北魏之云冈石窟，北齐天龙山石窟，唐龙门石窟等，则其逐渐进步之过程，无论何人均可一目了然。而见于其他方面者，如西汉霍去病墓之马踏匈奴像，与唐昭陵之石人马相较，其艺术之优劣，更不可同日而语矣。

与雕刻同时受佛教影响者，则为建筑之装饰。我国古代之装饰纹样，据已见之陶、铜器、骨、玉、石刻等所载者，大都取材于大自然，如日、月、星、云、山、水、人物、花、木、虫、鱼、禽、兽之类。此

外，应用几何图形者，又有雷纹、菱纹、斜纹、波纹、环纹、连锁等若干式样。俟至佛教东来，印度之莲瓣、相轮与葱形尖拱（Ogee arch），遂连带输入我国。而波斯之翼狮（Winged lion），希腊之人像柱、卷草（Acanthus scroll）、瓣纹（Plaited ornament）、沟饰（Flutting）、棕叶饰（Anthemion）、叶与舌饰（Leaf and tongue）、爱奥尼克柱式（Ionic order）、科林斯柱式（Corinthian order）等，亦因佛教之媒介，得以流播中土。以上各种装饰，在南北朝时，大抵与我国固有之装饰参差混用，如大同云冈石窟，即其最显著之例。其后，装饰之题材不适合我国之习惯与国情者，渐次归于淘汰。今之存者，如莲瓣、相轮、葱形尖拱等，尚为佛教建筑之重要装饰。而最普及者，无如希腊之卷草。唯自隋、唐以后，或变为简单之忍冬草，或易以繁密之牡丹、石榴花，流行衍蔓，遍于全国，不知者几不能辨为西方之装饰矣。

二、构造

我国之装饰雕刻，受佛教影响已如上述矣，然则我国建筑之构造，是否亦受同样影响？吾辈欲阐明此问题，必须比较佛教输入以前之建筑构造，与输入以后者，有无差异之处？如其有之，是否即为佛教影响所致？

我国建筑之构造，系以阶台、础石、柱、梁、浮柱^[2]、栋、桁、角梁、椽、斗拱、飞昂等为骨体，而墙壁与门、窗，不过填塞柱与柱间之空间，用以区隔内外，阻蔽风雨而已。以上诸项，均为构成我国传统建筑之基本成分。其源始之时代虽不能明确断定，然其名称大都散见三代、秦、汉典籍之内，兹逐一举例如次：

阶台 《礼记》云：“成功幼，不能蒞阼”。阼者，阶台之主阶也。

础石 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山云蒸，柱础湿”。

柱 《诗》云：“有觉其楹”；《春秋》云：“丹宫楹”。楹者，柱也。

梁 《长门赋》云：“抗应龙之虹梁”。虹梁者，向上弯之曲梁也。

浮柱 《论语》云：“山节藻梲”。梲，即浮柱，梁上短柱也。

栋 《易》云：“栋隆吉”；《仪礼》云：“序则屋当栋”。栋者，今之脊桁也。

桁 《礼记》云：“主人阼阶上立，当楣”。楣者，承椽之桁木也。

角梁 《景福殿赋》云：“承以阳马”。阳马者，屋四角承椽之角梁也。

椽 《易》云：“鸿渐于木，或得其桷”。桷者，椽也。

斗拱 《论语》云：“山节藻梲”。节者，斗也。又《长门赋》云：“施瑰木之栌橰兮”。栌橰，即斗拱也。

飞昂 《景福殿赋》云：“飞昂鸟跃”^①。

藻井 《灵光殿赋》云：“圜渊方井，倒置荷蕖”。方井，方形之藻井也。

栏杆 《西都赋》云：“舍棖槛而却依”。棖槛，即栏杆也。

屋顶 我国古代建筑之屋顶，其发展之顺序，约可分为三期：

(1) 我国建筑大都南向，故最初之屋顶，多系南、北二面泄水，其断面如人字形。

(2) 次为四泄水之制。除南、北二面外，复有东、西二翼。《仪礼》云：“直于东荣”。荣者，翼也。东荣，即东面之檐。

(3) 再次为屋面反翘之制。《西都赋》谓：“上反宇而盖载”。反宇，即屋面因呈曲线而上反也。

^① 整理者注：汉代斗拱中恐尚无斜向若昂之构件。该赋中所云“飞昂”，可能是表示一种飞翔向上之状态。

又《礼记》云：“复雷重檐，天子之庙饰也”。可知周代寝庙之制，已非简陋之单檐建筑矣。

就以上诸例而观，可知我国建筑之基本构造，肇源远在秦、汉以前。其时佛教尚未输入，中国建筑未受此文化之影响，殆无疑义。而时至今日，凡为我国古代建筑物之主要构材者，仍为主要构材如故。则在此二千年间，建筑物之骨构绝少变更，又可知矣。据此推论，佛教文化对中国建筑构造之影响，自可不言而喻。不仅是也，即佛教特有之建筑，如寺、塔、石窟之类，其最初模仿印度者，不出数百年间，亦演绎同化于中国建筑之内，兹举数例以明之：

塔

塔者，为古代印度之墓标。梵音为Stupa，释籍译为“窣堵坡”，其义为“累积”，盖累积土、石于墓上以为标记也。其后释迦弃世，门人以香木焚尸，其骨分碎，大小如粒，不能尽毁，乃建窣堵坡藏之，后世所谓舍利塔是也。至于塔之构造，由台座、覆钵、宝匣、华盖四部组合而成。台座者即塔之基座；其上为半球状之覆钵，形如穹顶（Dome）；覆钵顶部为宝匣，其形如方箱，中藏舍利，最上为华盖，作三层伞状。塔之内部，实以泥土，不能登临，盖纯为纪念物也。我国之塔，当以汉明帝永平十八年（公元75年）所建之洛阳白马寺塔为最先。据《魏书·释老志》所载其形状悉依印度之式样而重构之。此外，如敦煌千佛岩第120窟^[3]内之塔，亦尚存印度窣堵坡之遗范。其后塔之构造，自石造易为砖、木，塔内设佛龕，又置梯级以便登临，其外部更绕以栏廊，覆以重檐，则与我国传统之木楼阁建筑日益雷同矣。

寺

古代印度之寺，皆以塔为中心。塔之周围，罗列禅堂、静堂、僧房、庖厨、浴室、而圜之属，视后世以佛殿为寺之中心者，截然异途。我国初期之寺，大部袭用印度之制，以塔为寺之主要建筑物。故汉、魏籍典，盛称浮屠而不称寺，盖以塔为寺之代表也。东晋、北魏以后，渐重佛殿，置本尊像于佛殿中，以供祈祝祷膜拜之用，于是佛殿遂代塔而为寺之重心。其余法堂、讲堂、禅堂、食堂之类，依次排列于佛殿之前后，其配置之法，纯为我国均衡对称之方式，非复印度旧观矣。

石窟

石窟者，释籍谓之“支提”。盖设支提塔之窟内，作为仰礼之对象，因以为名（梵音为Caitya，与窣堵坡同形状，唯不藏舍利）。我国最初创立之石窟，当推前秦建元二年（公元366年）所建之敦煌千佛岩，其后继起者如凉州石窟寺，大同云冈石窟，洛阳龙门石窟，南京摄山千佛岩，巩县石佛寺，青州云门山、驼山^[4]，肥城五峰山，历城神通寺，邠州大佛寺^[5]，广元千佛岩，太原天龙山等，均为南北朝及隋、唐等代所经营之石窟也。其中规模宏大者，当以北魏所建之云冈石窟为最。云冈诸窟之中央，大多设本尊像或方形之支提塔，与印度石窟之配置法，大体略同。其后北齐至隋、唐所营之天龙山石窟，内中已无支提塔，而于窟前辟走廊，廊间镌以柱、梁、斗拱之属，其上再护以短檐，至此石窟之外观、结构，遂与我国传统之木造建同一形制焉。

注释

[1] 今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，建于北凉宣武王沮渠蒙逊时期（公元401—433年）。

[2] 即侏儒柱。见《营造法式》卷五·大木作制度二·侏儒柱条。

[3] 现编号为288窟。

[4] 今山东益都县境内，凿于北周至隋、唐间。

[5] 今陕西郿县西10公里，建于唐贞观二年（公元628年）。

[本文发表于《科学》第十三卷第四期（1928年）。为作者潜心于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后，发表之首篇论文。]

中国之塔

——在中国建筑师学会上的讲演稿

主席、各位先生：

在我今天介绍“中国之塔”以前，首先要向各位申明的，就是这次讲演的内容要作一些减削。因为今天大会所许可的时间，至多不能超过三刻钟，在这样的条件之下，我只有将讲演的内容尽可能地简化。一切问题，只谈结果，而不谈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和演变的经过。这种讲法，当然很不合逻辑，同时内容也许过于简略，希望大家能够原谅。

提起塔，我想大家心目中，早已有了一个轮廓。各位以往在国内旅行，一定看见过许多形状不同的塔，或者在城市、在乡村，或者在山

巅、在水涯，或者在茫茫大漠、黄沙衰柳之间，构成了不少美丽而雄伟的图画。塔的确是中国建筑中最有魅力的景物之一，也是中国景观的最好象征，值得人们流连赞赏。不过我们如果离开艺术鉴赏，站在历史的立场来说，它可是出乎意外的并非全由中国所创造。这是因为在汉代以前，我们的高层建筑，只有楼、阁、台、闾，而无所谓的塔。文献里面也没有塔这个名称。到后来，印度的佛教经犍陀罗（Gandhara）和西域诸国辗转东传，于是在佛教建筑中占重要位置的塔，才出现在中国。

佛教在何时传入中国？中国的第一座佛塔又建于何时何地？根据《魏书·释老志》所载，后汉明帝因梦见金人，遂派遣博士弟子秦景、蔡愔等往印度求佛法。使者于途中遇沙门摄摩腾、竺法兰携经东来，就迎接他们返回中国。于永平十一年（公元68年）到达洛阳。为此，明帝就在洛阳西门外，建造了一座白马寺。这建寺也许确有其事，但佛教传来中国，当在明帝求法以前，否则梦见金人，何以知其为佛？又何以知此佛生于印度？近来许多学者对此有详细研究，我就不予重复叙述了。至于白马寺内，传说绘有千乘万骑绕塔三匝的图像，但当时寺内曾否营造佛塔，因史无明文，不敢臆断。

至于我国早期佛塔的形状，《释老志》载：“凡宫塔制度，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”。可知系完全模仿印度式样。但至少到汉末献帝中平、初平年间（公元189—193年），已有中国传统木架构之木塔出现。如笮融于徐州所建之浮屠祠，亦见于史籍。可惜的是北魏中叶以前的许多重要实例，都已荡为烟雨，只能依靠不完全的文献，知道其中部分情况而已。现在国内所存的佛塔，以北魏正光四年（公元523年）所建的嵩山嵩岳寺塔为最古。从那时起到最近为止，国内现存大大小小的塔——大的约高80米，小的不过1米左右——何止数千。但塔的形范，归纳起来却不过几种。至于如何分类，德国的鲍希曼（Boeschmaum）和日本的伊东忠太，都各有不同的见解。现依我与梁思成先生的意见，则可暂分为